

今本《老子》与简本《老子》的关系

张 涅

郭店楚简发现以来，简本《老子》与今本《老子》^①的关系成为学界讨论的一个热点。目前比较有影响的观点有三种：（1）摘抄说，认为简本是一个摘抄本，意即它属于今本的祖本的一部分^②；（2）别系说，认为简本和今本相互并行，各有传承系统^③；（3）传承说，认为今本承传简本而来，两者有传承关系^④。笔者排比研读，感到今本异于或多于简本之处都可以从文字修饰和思想发展等方面予以解释，故而认为传承说比较合理。鉴于诸位先生言之未详，试作补充论述。

一、文字内容的修改和充实

简本《老子》有2046字，内容与今本的三十一个章节相关。相互比较可知，今本对于简本在文字上有许多变动，而且增加了不少辞句。进而做具体分析后发现，这是一种内容表达上的修饰和充实。其中可分三种情形：（1）修改、增删文字使意义明确，（2）增加辞句对简本内容作阐释，（3）增加辞句表达感慨。此可以证明两者确实存在着承传的关系。

（一）修改、增删文字使意义明确。例如，简本：“衍（道）亘（恒）亡为也，侯王能守之，而万勿（物）牷（将）自恆（化）。”今本为：“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之，万物将自化。”（37

章)多了“无不为”，强调了手段和目的的关系，提纲挈领，意义较之简本更明确。多了“若”字，假定推论的关系也更清楚。简本：“卑(譬)道之才(在)天下也，猷(猶)少(小)浴(谷)之與江海(海)。”今本改“少(小)”为“川”(32章)。意“道”如“江海”，天下万物如“川谷”；江海是百川的归宗，即“道”是天下万物的根本。显然把“少(小)浴(谷)”改为“川谷”更能强调“道”的根本性。简本：“天道员员，各復其堇(根)。”今本改为：“夫物芸芸，各复归其根。”(16章)“各復其堇(根)”的主语应该是“物”，改动后意义更清通^⑤。简本：“法勿(物)慈(滋)章(彰)，覩(盜)惻(賊)多又(有)。”今本改“法勿(物)”为“法令”(57章)，意义明晰。简本：“员(损)之或员(损)，以至亡为也，无为而亡不为。”“或”可释为“又”，《经传释词》曰：“或，犹‘又’也。”但今本改“或”为“又”(48章)，后人更容易理解。简本：“江海(海)所以为百浴(谷)王，以其能为百浴(谷)下。”今本改后一句为“以其善下之”(66章)，简洁。

(二)增加辞句对简本内容作解释。例如，今本第30章在简本“以衍(道)差(佐)人室(主)者，不谷(欲)以兵强於天下”之后加入了“其事好还。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军之后，必有凶年”一段，对于上句“兵强于天下”的灾难必然性作了阐释。简本：“为亡为，事亡事，未(味)亡未(味)。大少(小)之多惕(易)必多墾(难)。是以圣人猷(犹)墾(难)之，古(故)终亡墾(难)。”今本第63章在“未(味)无未(味)”之后插入了一大段：“大小多少，报怨以德。图难于其易，为大于其细。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是以圣人终不为大，故能成其大。夫轻诺必寡信。”这段话是关于如何“无为”的“为”的认识。今本第16章在简本“万勿(物)方(旁)复(作)，居以须复也。天道员员，各復其堇(根)”后补上：“归根曰静，是

谓复命。复命曰常；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久。没身不殆。”则是对“静观”的认识论的补充解释和发挥。今本第 55 章在简本“勿（物）墾（壮）则老，是胃（谓）不道”后补上“不道早已”一句，是对上句的推断。

（三）增加辞句表达感慨。例如，简本“絶（绝）学亡患（忧）。唯與可（呵），相去幾可（呵）？嵞（美）與亞（恶），相去可（何）苦？人之所懼（畏），亦不可以不懼（畏）。”今本在后面补上：“荒兮其未央哉！众人熙熙，如享太牢，如春登台。我独泊兮其未兆，如婴儿之未孩，儻儻兮若无所归。众人皆有余，而我独若遗。我愚人之心也哉，沌沌兮！俗人昭昭，我独昏昏；俗人察察，我独闷闷。澹兮其若海，飈兮若无止。众人皆有以，而我独顽以鄙。我独异于人，而贵食母。”（20 章）这一大段是简本《老子》的传承者对上文“绝学无忧”的发挥，蕴涵着不尽的感慨。“学”对于生存的幸福有什么样的意义呢？在情感的抒写和理性的反省中表达了“独异于人而贵食母”的信念。张松如先生说：“这是一首自嘲实则自赞的诗篇。”^⑥诚如此。

二、道家思想的源流发展

《老子》是道家的经典著作，从今本看，具有鲜明的非儒性和权术性的思想特质。但是，简本内容并没有与儒家传统尖锐对立，只是道家思想的滥觞。这种差异正是今本继承简本并加以发展的结果，说明两者有着源流关系。

（一）非儒性。学者们都注意到简本没有今本那样鲜明的非儒性。例如今本第 19 章曰：“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简本则为：“絶（绝）智（知）弃卞（辩），民利百怀（倍）；絶（绝）攷（巧）弃利，覩（盜）惻（贼）亡又（有）。絶（绝）伪（伪）弃慮，民復（復）季（孝）子

(慈)。”少了“绝圣”、“绝仁弃义”这些明显否定儒家价值观的辞句。今本第18章曰：“大道废，有仁义；慧智出，有大伪；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简本（丙）则为：“古（故）大道廢（废），安有急（仁）义。六新（亲）不和，安有孝慈（慈）。邦家（邦）婚（昏）[乱]，[安]又（有）正臣。”多了一个“安”字，意义变化。“安”是“哪里”、“怎么”的意思，即大道废掉了，哪里还可能有仁义呢？“道”是价值根本所在，而“仁义”也是被肯定的^⑦。傅奕本“安”作“焉”，意同。这个思想与传统儒家很接近，儒家也讲“天道”，只是落实到以“仁义”为核心的“人道”中，更追求社会实践意义而已。但是，在今本中“仁义”成为了一种负面的价值观。章句中一些文字的更动也使思想意义发生变化。例如简本曰：“至虚，亘（恒）也；默（守）中，笃（篤）也。”“守中”与儒家传统思想相似。《论语·雍也》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今本改为“致虚极，守静笃”（第16章），纯粹表述道家消极无为的人生论，如尹振环先生说：“道家超然物外的态度加强了。”^⑧

今本《老子》向非儒性方面的思想发展也正合乎《庄子·天下篇》对于先秦学术发展规律的描述。《天下篇》认为，先秦学术思想的发展概之可分“道术”和“方术”两个阶段。“道术”时代思想统一，以“内圣外王”为实践理想，而承担这种思想和实践任务的是“儒”。《周礼·大宰》曰：“儒，以道得民。”郑玄注：“儒，诸侯保氏有六艺以教民者。”即“儒”是一种以传授六艺为职业的社会成员，最早的“儒”并非后来百家中的一派，可谓士人的概称。春秋末期以后，则把继承传统，以实践周礼为价值目标的一派延称为“儒家”。因此，早期儒士的思想有很大的相同性，并非像“方术”时代那样分裂为各家而尖锐矛盾。现在我们阅读《论语》，从“吾与点也”感受到道家的人生论，从“四海之内皆兄弟”中领会墨家的“兼爱”说，“道术”时代思想的包容性和统

一性可见一斑。简本《老子》当也属于“道术”时代儒士的思想产物，故而没有尖锐地批判传统，没有与传统构成对立。春秋末期以后，随着社会形势的发展，学术思想界进入了“方术”争端的时代，“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天下》）。今本《老子》在这种时代思潮下改造简本《老子》，对传统思想进行了深刻批判，从对“智”、“辩”等一般社会价值观的批判发展为否定传统儒家的政治价值观念。有些学者根据简本和今本的思想差异认为两者各有传承系统，似不理解先秦学术发展的这种特征。在传承过程中更动文字、增入注释内容等都是进行思想创造的一般形式，《老子》从简本到今本的发展又是一个例证。

（二）权术性。郭沂先生曾认为简本《老子》没有君王南面之术^⑨，此立论过甚。简本“絝（绝）智（知）弃卞（辩），民利百怀（倍）；絝（绝）攷（巧）弃利，覩（盜）惻（贼）亡又（有）。絝（绝）恇（伪）弃慮，民复（復）季（孝）子（慈）”，讲的就是统治手段。“以亡事取天下”，“亡为而亡不为”，也阐述了这种政治统治的原则。但是，毫无疑问，今本对于“无为”的统治术更加强调，表达也更加简明。尹振环先生说：“竹简《老子》也是谈治术、治道及统治者修养的，并非全无权术，……正是由此发展到帛本的愚民，不尚贤的。”^⑩具体地看，有两个方面的发展：一是愚民策略，如“不尚贤，使民不争”（3章），“非以明民，将以愚之”（65章）；二是阴谋手段，如“将欲歛之，必固张之”，“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36章）。

显然，权术性的发展也即政治理性的发展，也表明了今本对于简本的承传关系。先秦儒家考虑的核心问题其实也就是政治问题，它把以血缘情感为基础的家庭伦理推衍至国家政治领域，虽然洋溢着人伦价值的光辉，但是难以适应国家形态发展的要求。而《老子》能对汉民族文化历史产生深刻影响，主要在于对血缘政治观的批判和超越，提出了基于历史经验和功利目的之上的，分析

利害关系和发展可能的权术性认识。在简本中，它主要还是从自然经验而来的朴素认识，认为政治应该像自然一样无为而为。到了今本，则进一步发展成了追求更大的、更根本的功利效益的目的和手段的关系论，表现出深刻的阴谋性。

三、逻辑理性和形而上思维的加强

今本《老子》对于简本《老子》文字内容的更动、增删，不但表示了思想内容的发展，而且还蕴含着思维形式的自觉要求。这种自觉要求主要表现在加强逻辑理性和形而上认识两个方面。从这个层面也可以认识到两者的关联。

(一) 逻辑理性的加强。先秦诸子作品有从语录体向文章体发展的过程。语录体以句为基本单位，大多表达直觉感受或判断性的认识。文章体以篇为基本单位，对思想观点有比较全面深入的论述。作为两者之间的过渡，有以章为基本单位的片断形式，它或者是有客观情景的对话记录，或者是主观思想的阐述。自然，与相对简约的语录体中的判断性认识相比，它在主观阐述中更多了推论，更有逻辑理性的自觉要求。从这一方面看，今本《老子》也是承传简本《老子》并有所发展。例如，今本第46章：“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比简本多了一个“故”字。没有“故”字，前后句可理解为各是经验性的判断和告诫；增加这个字，相互就构成了一种逻辑关系。再如简本曰：“江海（海）所以为百浴（谷）王，以其能为百浴（谷）下，是以能为百浴（谷）王。圣人之才（在）民前也，以身后之；其才（在）民上也，以言下之。其才（在）民上也，民弗厚也；其才（在）民前也，民弗害也。天下乐进而弗沾（厌）。以其不静（争）也，古（故）天下莫能与之静（争）。”今本第66章把第一句的“是以”改成“故”，第二句改为“是以圣人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第三、四句句首增加了“是以”。显

然，三个“是以”把该段原本内在的因果逻辑和层进发展的意义明白地揭示出来。第二句改为“欲……必”句式，原先的经验判断形式也改成了假设推理。简甲本曰：“此亡败事矣。”丙本曰：“则无败事喜（矣）。”今本第 64 章定为“则无败事”。舍“此”用“则”，也意在表示与上句的逻辑关系。再如简本曰：“和曰稊（常），智（知）和曰明。”今本第 55 章改为“知和曰常，知常曰明”。郭沂先生认为今本加“知”重复，简本优^⑩。其实，今本改动后明白表示了一种层进关系，其意义不能简单否定。

（二）形而上的认识企图。今本《老子》从本质上讲并没有建构起形而上的思想体系。“道”似乎是形而上的存在，其实依附于特定社会对象的实践活动。陈鼓应先生曾说：“老子所预设的‘道’，其实就是他在经验世界中所体悟的道理，而把这些所体悟的道理，统统附托给所谓的‘道’，以作为它的特性和作用。”“形而上学只是为了应合人生与政治的要求而建立的。”^⑪但是，在这种依附性中，显然已经有形而上的思想企图。这种思想企图较之简本也更为加强。简本若干章句已经把现实层面与形而上的“道”层面联系起来认识，例如“衍（道）亘（恒）亡为也，侯王能守之，而万勿（物）眚（将）自伪（化）”，但是今本对于这方面的阐述更多。郭沂先生已经注意到今本中那些比较玄奥的章节、段落不见于简本，例如讲“道可道，非常道”、“元之又元”的第 1 章，“谷神不死，是谓元牝”的第 6 章，“无状之状，无物之象”的第 14 章，“道之为物，惟恍惟惚”的第 21 章，“道生一，一生二”的第 42 章，“道者，万物之奥”的第 62 章等^⑫。今本增加的这些章句，无疑是理性向形而上发展的结果。而且，在简本若干章句中加入文字内容，也旨在加强这一点。例如简本曰：“闔（闭）其门，塞（塞）其兑（兑），终身不啻。启其兑（兑），塞（塞）其事，终身不速。”纯粹是一种经验性认识。而今本在之前缀入“天下有始，以为天下母。既得其母，以知其子；既知其子，

复守其母，没身不殆”，之后加入“见小曰明，守柔曰强。用其光，复归其明，无遗身殃。是谓习常”（52章），把经验性认识放在形而上认识的“道”的背景下，强调了认识“道”对于现实理性的根本意义。再如简本曰：“君子居则贵左，用（用）兵则贵右。”今本在之前加入了“夫佳兵者不祥之器，物或恶之，故有道者不处”（31章）一段，把反战的现实认识提升到一般理性的高度。王弼以为“自‘兵者，不祥之器’以下，似经注相间，疑古之义疏，混入经文者”（魏源《老子本义》），注意到了后人的注释可能，但没有认识到它是后学思想发展的表现。这些也证明了今本《老子》对于简本《老子》既有继承性又有发展性，两者属于同一系统。

四、语调、句式、音韵的修饰

今本与简本比较，语调和句式这些表述形式也有变异发展，对音韵更加讲究。

（一）语调。简本比较明显地留有口语记录的痕迹，句末大多有“也”字，而今本基本上改成了书面语。例如简本曰：“圣人之才（在）民前也，以身后之；其才（在）民上也，以言下之。”今本改成：“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66章）简本曰：“至虚，亘（恒）也；默（守）中，笃（笃）也。”今本改为：“致虚极，守静笃。”（16章）在简本中，表示句末语气的“也”出现55处，而今本相对应的章句中仅有3处。其中第55章保留2处：“未知牝牡之合而全作，精之至也。终日号而不嗄，和之至也。”为了补音节。另一处在王弼本第32章：“天下莫能臣也。”而河上公本作“天下莫敢臣”，傅奕本作“天下莫能臣”，都没有“也”。大量“也”字的删略，无疑表现了语调的书面化。从口语性到书面性的变化，是先秦著作语言发展的规律。因为文化发展的复杂性和丰富性，我们不能简单化地划分口语记录时代和书面

语言时代，但是就一种先秦著作而言，在流传的过程中先有口语记录体，再改造成书面语言是肯定无疑的。简本和今本的语调差异正是著作承传在不同阶段的标志。

(二) 句式。与口语修饰为书面语的同时，句式也由散体向诗体变化。简本已经有四言、五言句式，但还不是一般性的形式。而在今本中，四言、五言句式最多见，显然今本对简本作了改造。例如，把“其安也，易案也，其未兆（兆）也，易悔（谋）也”改为“其安易持，其未兆易谋”(64章)；把“返也者，道僮（动）也。溺（弱）也者，道之用（用）也”改造成“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40章)。再如简本原为“古（故）不可得天（而）新（亲），亦不可得而疋（疏）；不可得而利，亦不可得而害；不可得而贵，亦可^⑩不可得而贱（贱）”。今本第56章删掉了3个“亦”，使句式整齐如诗。简本原为“敷繆（穆），蜀（独）立不亥（改）”，今本第25章改为“寂兮寥兮，独立不改”，补上两上“兮”的音节后，舒展有度。简本：“上士昏（闻）道，堇（勤）能行於其中。中士昏（闻）道，若昏（闻）若亡。”今本第41章改“行於其中”为“行之”，使句式整齐，更朗朗上口。这种句式的修饰正是承传中发展的表现。

(三) 音韵。今本具有哲理诗的形式，朱谦之先生曾说：“《道德》五千言，古之哲学诗也。”(《老子校释·附录·老子韵例》)这也是继承简本音韵并进行修饰的结果。继承的例子很多，例简本：“太上下智（知）又（有）之，其即（次）新（亲）誉之，其既〈即（次）〉悁（畏）之，其即（次）彑（侮）之。”上古“有”、“彑（侮）”属之部，“誉”属鱼部，“悁（畏）”属微部，旁转押韵。今本第17章改为“太上，下知有之；其次，亲而誉之；其次畏之，其次侮之。”句式整齐，又保持了原有的韵律感。也有一些作了修饰加工。例如简本：“善建者不拔，善休者不兑（脱），子孙以其祭祀不屯。”上古“拔”、“兑（脱）”属月部，“屯”属文

部，音韵不能相转。今本第 54 章把末句改为：“子孙以祭祀不辍”。“屯”改成“辍”，“辍”也属月部。简本：“絝（绝）智（知）弃卞（辩），民利百倍。絝（绝）致（巧）弃利，覩（盜）惻（贼）亡又（有）。絝（绝）恇（伪）弃慮，民复（復）季（孝）子（慈）。”“倍”、“有”、“子（慈）”同属之部。“利”属脂部，“慮”属鱼部，可与之部旁转。但是“卞（辩）”属元部，韵不能相转。今本改为：“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智”属支部，“义”属歌部，都可以与之部旁转。显然，今本对于简本不但在思想内容上有质的发展，表达形式上也作了改造加工。这些都无疑证明了两者的承传关系。

从上述四个方面的比较认识看，简本不应该是今本祖本的摘抄本，因为在两者相对应的章句中，不仅文字上有更动增删，而且思想内容、思维形式和表述形式都有明显的差异。两者也不应该是各有传承系统的并行关系，因为其中的发展轨迹很清楚。因此，比较合理的推论是两者有前后相承的传本关系。《老子》初期也为口语记录体，思想也在一般传统的范畴内，与《论语》没有大的矛盾，先秦文献中有关孔、老关系的记述也可由此得到解释。它在流传的过程中修饰发展，约在战国中后期才基本定型。显然，作为对传统儒家的批判和补充的道家思想的载体，无疑以今本《老子》为代表。从思想价值和历史影响讲，简本《老子》不可能取代今本《老子》。

注：

①在现存的《老子》传本中，严遵、王弼、河上公、傅奕四本时代最早。唐宋以后，异本勘合，各种传本又辗转传抄，因此文字内容基本上同流合一（参见高明《老子·前言》，中华书局“四部要籍注疏丛刊”，1998 年 5 月版）。本文的简本引文据《郭店楚墓竹简》，文物出版社 1998 年 5 月版，今本引文据“华亭张氏原本”，个别差异处另作注释。

②例如唐明邦先生认为简本是“东宫之师”节录《老子》而成。参见胡

治洪《学脉探源儒道合 人文成化古今谐——“郭店楚简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中国社会科学》2000年第2期。黄钊先生说：“竹简《老子》应为稷下道家传本的摘抄本。”参见《竹简〈老子〉应为稷下道家传本的摘抄本》，载《中州学刊》2000年第1期。

③例如邢文先生说：“郭店《老子》与今本《老子》不属一系。”参见《论郭店〈老子〉与今本〈老子〉不属一系》，载《郭店楚简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版，179页。李学勤、王中江等先生还认为简本《老子》可能属于关尹一派的传承之本。参见王中江《郭店竹简〈老子〉略说》，载《郭店楚简研究》，105页。

④例如许抗生先生说：“简本、帛书本、今本之间似有一个演变发展的过程。”参见《初读郭店竹简〈老子〉》，载《郭店楚简研究》，93页。尹振环先生《论〈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简、帛〈老子〉比较研究》（载《文献》1999年第1期），刘焕藻先生《郭店楚简〈老子〉研究》（载《理论月刊》1999年第5期）等也持此说。

⑤⑧⑩参见尹振环：《论〈郭店楚墓竹简老子〉——简、帛〈老子〉比较研究》，载《文献》1999年第1期。

⑥张松如：《老子读解》，齐鲁书社1987年4月版，138页。

⑦李存山先生《从郭店楚简看早期道儒关系》（载《郭店楚简研究》）、刘焕藻先生《楚简〈老子〉研究》等释“安”为“于是”，不妥。

⑨《从郭店楚简〈老子〉看老子其人其事》，载《哲学研究》1998年第7期。

⑪⑬《楚简〈老子〉与老子公案——兼及先秦哲学若干问题》，载《郭店楚简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99年1月版，121~122页，129~130页。

⑫《老子注释及评价》，中华书局1984年5月版，1页。参见拙作《〈老子〉“道”的依附性和原始巫术思维》，载《江海学刊》2001年第3期。

⑭“可”，衍文。

作者工作单位：浙江海洋学院中文系（作者本名：张湜）